

多元文明交融视野下的文化景观视点 ——以西南地区为例

张祖群, 赵 荣

(西北大学 城市与资源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对区域的文化交融研究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为此,笔者以三元文明交融的西南地区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并从西南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文明交融、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的文明交融、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半岛等的文明交融中概括了其文化景观遗迹类型。笔者以为:文化景观是空间整合的产物,是旅游拓展的良好载体,也是认识人地关系的线索,因而必须辩证认识地理环境对文化景观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交融;文化景观;空间整合;人地关系;西南地区;旅游拓展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4)03-0152-05

Relics of Cultural Landscape on Multi-dimensions Civilization —Taking Southwest Region as the Example

ZHANG Zu-qun, ZHAO Rong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Some people study the culture blending of regions in recent years with open arms. Southwest region which blended by three kinds of civilization is a typical case. The cultural landscapes are generalized from the blending of southwest region and middle Chang jiang river region, from the blending of southwest region and Huanghe river region, from the blending of southwest region and Dongnanya peninsula. This paper think, that cultural landscape be the result of space conformity, the good carrier of tourism colonizing, and the clue of how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so the effect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which affects the cultural landscape should be known correctly.

Key words: the blending of civilization; cultural landscape; space conformity;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southwest region; tourism colonizing

一、文化交融区研究进展

学术界对区域文化交融研究经久不衰。葛剑雄、曹树基^[1]认为,华夏汉族的形成发展和少数民族的迁移变化,最终导致中华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它被解释为一个不断文化交融补偿的历史演进过程。邹逸麟^[2](p9-54)以中国历史文化的时间为序列,将中华文化区看成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交融区,探讨了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彭树智^[3]认为,文明交往是关于全球文明和谐问题的科学课题。就其本质来说,文明的本质在于交往与融合,交往与融合的价值在于文明。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趋势,世界文化也呈现出多元文

化交融情形^[4]。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挑战和发展的机遇。为此,我们应开展文明对话,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近年来,学者研究多集中于国家或全球的尺度,对典型的小尺度区域研究还不多见。事实上,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文化体系相互交融,已经形成了各种异质文化景观。

二、西南地区的多元文化交融

(一)地理概况

中国西南地区,主要包括今之川、滇、黔、藏,甚至包括广泛意义上的汉中。在历史进程中,西南地区的整合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一方面,由于中央王朝的活动长期集中

收稿日期:2004-03-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0101008)和陕西教委专项基金(00jk160)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祖群(1980-),男,湖北孝感人,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地理、旅游地理等研究。

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远离这些地区的所谓“边地”往往容易成为王朝控制体系的末端,不仅在开发程度上远远逊色于中原地区,而且在较长的时段里一直作为少数民族的势力范围,与中央王朝保持一种非统辖关系。在地形上的相对封闭性也使西南地区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另一方面,正是在远离中央政权的前提下,西南地区充当着不同地域文明之间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等彼此交流、融合、共生共存的舞台。

实际上西南地区受多种文明交融的影响,核心上处于三种文明交融之中形成了一个巨大三角形。从区位看,西南地区北接黄河流域,南与印度、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为邻,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度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枢纽,中国乃至亚洲的几个主要文化区都在这里延伸、接触、交融,从而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显示出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和南方水田稻作农业文化的交汇和碰撞;从整个亚洲来看,东亚大陆的农耕文化与西太平洋渔猎文化在这里延伸与交融。这种碰撞与交融导致了西南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正是在多种文化的交融与作用之下,才使西南地区产生了发达的滇国青铜文化和蜀国三星堆文化,它们以丰富的内涵、独特的民族风格在中国乃至亚洲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生态环境构成了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的基本发展背景和基础。各民族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结成了紧密的关系,甚至互相融合^[5]。生态环境和由

生态环境所决定的生产方式、社会发展程度等构成了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的基本发展背景和基础。西南民族曾在西南地区建立过巴国、蜀国、滇国以及吐蕃、南诏、大理等政权,此外西南地区还有像夜郎、句町这些有历史影响的政治集团。

(二)西南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文明交融

1.历史上从关中穿越秦岭的川陕交通孔道

嘉陵、褒斜之开辟,远在先秦,子午道成于西汉初年,刘邦入汉中之际。褒斜道和金牛道是巴蜀地区通向北方关中地区的一条道路,也是自古以来古蜀国北连周、秦的交通干线。此道最初出现的年代可能很久远,以后秦国和蜀国都曾出动力维修过,多凭栈道而通。汉代,刘邦入汉中走子午道,北定三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即由嘉陵故道返。

汉武帝重修褒斜谷,成为常途,沿路保存了许多石刻。如《杨君石门颂》、《右扶风孝君志》,反映此段道路的使用频繁。但是,因水流湍急,谷中多乱石,漕运不便。西羌骚扰时,临时东修子午道入川,乱平之后,又恢复以褒斜道为川陕主要通道。褒斜道与嘉陵道之间另辟有新道,经今陕西留坝越岭与凤州相连,史书称:“迴车道”。史载迴车道始开凿于拓跋魏时期,实际可能比之更早。民国抗战时期,重修此段盘山道路,时至今日,川陕公路仍然是从宝鸡——凤州——留坝——汉中,再经沔县——宁强——广元而至成都。上述四条道路的终点都是汉水上游谷地的汉中,后抵成都(表1)。因此,汉中在历史上輶毂四方的军事地位非常重要。

表1 穿越秦岭的川陕要道

古道名称	别名	地理区位
陈仓道	故道、嘉陵道	北有塔河,南连嘉陵江,道路平易,但是迂远,有水运之便
褒斜道	其北段称褒斜道,或称斜谷道,其南段称石牛道或金牛道	由今陕西沔县西南越七盘岭入川,至今广元朝天驛顺嘉陵江河谷而下,这是历代由汉中入蜀的大道;古斜水(今陕西省石头河)与古褒水(又称黑龙江)之间,山体陡急,但是近捷,并与汉中相连
说略道		说水与驷水之间,水流短,缺水带长,其南端亦与汉中相连
子午道		长安正南之道,没有较长的河流,河谷破碎。其南抵汉水,西行与汉中相连

2.历史上穿越大巴山的川陕交通

四川盆地北缘大巴山一线,因嘉陵江在广元昭化切割一个缺口,盆地与陕南的联络自然便利。成都至昭化的交通多沿盆地边缘的山麓,抵达剑阁。大巴山裂开一条隘路,即有名的剑门关。因翻越米仓山、大巴山联系四川盆地内的道路终点不如汉中集中。因此,穿越大巴山有三条通道(表2)。

表2 穿越大巴山的川陕要道

古道名称	战略区位
剑阁道	直通省会成都,最为重要,或直取绵阳、成都,又可以顺嘉陵江而下重庆
米仓道	借用南江水运之便,可抵达南江、巴中等地
洋巴道	北与荔枝道相通,南连万源、达县、重庆、涪陵

四川盆地内的交通主要是江水道。其路线为从成都顺着今岷江而至夔道(今宜宾)入长江,再沿江而下。这是一条沟通

巴蜀地区内部以及巴蜀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联系的主要通道。《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威胁楚王时便声称秦的“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而下,至楚三千余里”秦将司马错即是从蜀地顺江而下伐楚的。秦代以前这条水路的航运可能很艰难,尤其是对于大型船只而言更是如此。因此,秦灭巴蜀以后,李冰曾对这条水道进行过大规模的整治疏通。此外,估计秦时西汉水(今嘉陵江)也已作为从四川北部葭萌经阆中到江州(重庆)之主要水路。

(三)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的文明交融

西南边疆今天的民族构成与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绵延不断的人口迁徙有密切关系,这些迁徙活动有五大特点,与今天的人口流动有异亦有同,文化和生态环境是西南地区历史上人口迁移特点的决定性因素^[6]。

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交融自古有之,如三星堆文化即带有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特点,并与之有密切关系;

唐以后,文明交融以“湖广填四川”影响尤甚^[7](p307-310),伴随着大量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居民移民以四川为主要目的地的西南地区,在吸取丰富湖广文化基础上迅速获得新的文化基因。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发生在元末明初。宋元之际,四川饱受战乱,人口损耗严重,最多时人口仅70万人;元末明初战乱更起,整个长江中上游地带均受到极大摧残。为避战乱,大批湖广人移民四川。明末清初,四川人口损耗极大,清初土著残存很少,县志中多有“百不存一”、“土著仅十之一二”的记载。估计清初四川残存人口仅50万或60万。顺治十一年(AD1654)清政府鼓励移民入川垦殖,允许“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至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达到高潮,其中湖广籍移民占总数35%左右。

西南边疆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是有一定特点可寻的,这些特点有的是地域性的或民族性的,有的则是各地人口迁移的共同特征。各民族总体向南迁移的趋向是一种地域特征,而向人口稀少地方迁移的特点则与现代农村向城市、西部向东部的流向相反;从山地到山地的迁移是自然地理气候、民族文化以及外来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族相聚的迁移原则是古今移民共同心理状态使然;边疆移民的递进式迁移是向边远和人口稀少地区的迁移,与当代农村人口到小城镇、小城镇人口到大城市的递进式不同。文化和生态环境是西南边疆历史上的人口迁移特点形成的重要决定因素。两次大的移民运动对恢复西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长江中下游的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农作物与新移民风尚,最终在长江中上游形成独特的川蜀文化。

(四)西南地区与东南半岛及印度次大陆的文明交融

西南地区官道的开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秦代和汉代。秦主要开通了巴蜀地区与北方之间和巴蜀地区内部的交通道路。汉则主要开通了巴蜀地区通向西南夷地区、西南夷地区内部,以及从西南夷地区通向其它地区的交通道路。

在中国历史上,甘青川滇直到东南亚的横断山纵列河谷受东亚历史气候与地理环境等影响,演出了一次次从北向南的民族大移民,称为“横断山民族大走廊”^[7](p302-305),它沟通了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文明交融。我国古代还有一条北起蜀地成都而经滇西出滇越(腾仲)延往异地他邦的古老通道。随后变成了由三条古道相交连接的驿道网络。由于古道出口过大批蜀产锦缎和滇西的丝帛、桐华布而被后人称作。“西南丝绸陆路”或“南方丝绸陆路”。西南丝绸之路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人民进步,沟通了云南与中外的音乐文化交流,对全人类的和平友谊、繁荣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宝贵贡献^[8]。

1. 五尺道

此路线为从夔道(今四川宜宾)向南进入夜郎地区的北部。《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曾命令秦吏常頔“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西汉武帝进兵西南夷地区时,又重修扩建此路并成为汉代的官道——南夷道的一部分。

2. 南夷道(附牂牁水道)

南夷道的路线北边一段与秦五尺道重合,南边一段继续向

南延伸,并与西夷道汇合。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在夜郎等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的同时,又命令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夔道指牂牁江”。即将道路从犍为郡的夔道修到了夜郎国的牂牁江一带(今贵州西部珠江上游的北盘江)。可能在元封二年,武帝第二次进兵西南夷并置益州郡前后,又将此道延伸到滇池一带并最终再向西延伸与西夷道汇合。在汉帝国的统治到达南夷地区之前,夜郎国就已经可以从水路沿牂牁江到达南越国的都城番禺。汉代时,这条水路更是从牂牁郡到南海郡的主要通道。

3. 西夷道

西夷道又可分为两段,即灵关道和博南道。汉帝国的势力到达西南夷地区之前,已存在着一条从成都经西夷地区通向身毒(天竺、古印度)的民间商道。汉代以后,这条道路也一直在利用,除了到达身毒之外,还可以向南沿今伊洛瓦底江到达今缅甸南部。前者大致从成都经青衣江至邛都(西昌),后者又从邛都延伸至不韦(云南保山)。大约在元封六年,汉武帝第二次进兵西南夷前后,开能博南道。根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孝武帝时通博南山(今云南永平西部),度兰沧水、渚溪,置嶲唐、不韦二县……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这段史实虽不见《史记》、《汉书》记载,却也能够证明从四川成都向云南西部的道路已经开通,史书也称“身毒道”。

自从秦开“五尺道”,汉武帝开“身毒道”(西南夷道),我国西南对外交通联系一步步打开。这条道路是从川、贵边界南至滇池盆地,再西去保山地区。以后从成都向西南经灵关,至邛都(西昌),再沿孙水而下至云南保山的道路开辟后,就奠定了川滇间的二条主要交通孔道,其交汇于永昌郡(保山、下关之间),永昌郡有路通缅甸、印度,成为公元1—6世纪西南对外通商的都市。东汉时,今缅甸南部的一些政权和部族即经此道向汉帝国朝贡。

云南东南有元江(红河上游)与越南相连。根据汉晋时期的文献记载,汉代时从益州郡和永昌郡还可沿仆水(今元江、红河)到达交趾郡。东汉时期,一些在中原为官的人曾南逃交趾,然后溯红河——元江进入东汉的益州郡(今云南昆明地区),再北上成都投奔刘璋。

唐朝时期,由成都通云南道路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名称有变化。汉灵关道改称:清溪道,秦五尺道、汉南夷(牂牁)道改称石门道。具体线路见《新唐书·地理志》载贾耽著《边州入四夷路》和樊绰于咸通年间(AD860-873)写的《蛮书》。

4. 清溪道

据《蛮书·云南界内途程》:自成都达南诏都城阳直咩城,共有2720里。其路程是由成都——双流县——新津县——临邛——雅州(今四川雅安)——名山县——严道县——荣经县——黎州——清溪关——嶲州(今四川西昌)——会川镇(今四川会理),乘皮船渡金沙江,过大岭至弄栋城——云南城(今云南祥云)——龙尾城(今云南下关),抵南诏都城阳直咩城(今云南大理)。

5. 石门道

石门道是在汉代五尺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戎州(今四川宜宾)至拓东城(今云南昆明),经过地点,据记载是:开边——石门——邓枕山——马鞍渡——蒙夔山——蒙夔岭——曲州(今云南曲靖)——拓东城。然后,西去,《蛮书·云南界内途程》:——安宁馆(今云南安宁县)——龙和馆——沙雌馆——曲馆——沙却馆——求赠馆——波大驿——白崖驿——龙尾城,遂达阳苴咩城。南诏谓入川清溪道是南路,石门道是北路。迄至宋初,石门道一直可通行。石门道较清溪道更难通行,驿馆等设施亦不如清溪道。

由云南出境的路径为:阳苴咩城——龙尾城——永昌(今云南保山)——诸葛亮城(今云南腾冲高黎贡山顶)——乐城(今云南龙陵),由此进入驃国,经万公(瑞丽江、伊洛瓦底江汇合处)——悉利城——驃国(今缅甸卑谬),西渡群山至东天竺迦摩波(今印度曼尼普尔),至今布拉马普特拉河下游。

南宋建立后,自西南向诸蕃买马的地点,由四川的黎州、戎州等地改为广西的横山寨(今广西的田东),宋买马提举司亦置于邕州。在此情况下,邕州道便取代石门道、清溪道成为宋朝联系大理国的主要通道。

蒙古帝国兴起,元宪宗二年(1252),蒙哥汗命忽必烈进攻云南大理政权。次年九月,忽必烈率军至达塔(今四川松潘以北与甘肃的草原谷地),兵分三路向大理进军。西路由兀良哈率领,经今之阿坝、壤塘、炉霍、新龙、理塘,入今之云南,经中甸等地攻大理。中路军前行,东路军殿后,沿吐蕃与宋朝势力相接的地带和川西滇北古道进军。经今茂汶(满陀城)、小金(懋功)、泸定、过大渡河,经石棉、冕宁、西昌、盐源,过金沙江入云南,经丽江等地攻入大理。蒙古军队南下所循道路形成今之“汉藏走廊”或“藏彝孔道”。至元十一年云南行省建立以后,先后开通的重要驿道有:由中庆(昆明)经乌蒙(昭通)至叙州(宜宾)道。在至元二十八年元朝开通由中庆经普安达黄平的交通线后,云南运往内地的纲运辐重,仍由乌蒙水道递运。

三、讨论

(一)多元文化景观是空间整合的产物

文化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西南地区处于沟通三种文明的枢纽位置,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大时空中,它是在融合进程中催生的,其兴衰则是与两大河流的文明交融和中国文化中心转移的节律联系在一起,并已最终成为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北而南的结穴。

从纯空间的角度看,西南地区并非一个非常整合的统一的区域,整个区域由多个小地理单元组成,小单元之间甚至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自古以来西南地区对于中原文化始终抱有认同感,尤其是在封建王朝中后期经济重心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西南地区经济向东倾斜的特点益加突出。这不仅与长江水道的利用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东边的处于强势地位的经济、政治控制力逐渐渗透到西南地区,最先受到影响的必定是东部地区。也许这样的认识并不过分:西南地区是这样的一个结合部,它将早期自然形成的中国西部高原文化和后期来自东部的平原文化整合在一块大的地域范围之中,并且有

效吸收来自黄河流域、东南半岛及印度次大陆文明,呈现在历史进程中的就是西部的起源和面向东部的转移过程。

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已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随之而来的是强势文化以普泛性知识的面目在全球流通,民族的价值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保留民族文化特色、为世界多留一分精彩,越来越成为必需面对的严峻问题^[10]。经济全球一体化给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趋同现象日益加深,而各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特色逐渐衰微。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对西南地区文明交融加以探讨,并尝试分析其多元文化景观特征,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民族文化危机。

由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道德规范、行为方式的差异悬殊,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必然存在不同的发展特色,形成多元文化发展格局。世界与我国多元文化格局的存在,使多元文化的交汇和融合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外来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共存共处,形成了区域文化景观的多元格局。

(二)文化景观是认识人地关系的线索

人文景观,亦称为文化景观是该地的某文化集团,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出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产品。现代文化景观理论发源于美国,索尔(Carl Ortwin Sauer)和惠特尔西(Vertexes)是其中的代表。美国人文地理学家索尔(Carl Ortwin Sauer)主张以解释文化景观作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核心。美国人文地理学惠特尔西创立文化史层研究(Sequent Occupancy),利用过去文化景观遗留下的遗迹,来探索地区文化景观过去的发展历程,这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种特殊方法^[10](p43-44)。文化景观之所以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是因为它现象地反映了文化集团的特征,这种文化集团可以理解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一定文化共性的人群集合体。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景观学者主张回归自然、保持乡土文化、兴起绿色运动、保护全球地理环境——我们共同的家园,这些均体现了一个精神实质,即保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减少人与大自然的对立矛盾。

当代中国许多人文地理学者应用与发展了现代西方文化景观理论。如司徒尚纪^[12]研究了广东区域文化景观,赵荣和李同升^[12]研究了陕西文化景观,胡兆量^[13]则从全国意义上研究了区域文化景观形成的差异条件以及语言文化景观、文学艺术文化景观、人才景观、饮食景观、建筑园林文化景观等。俞孔坚全面阐释了景观的意义^[14](p11-127)。一个景观包括空间上彼此相连、功能上相互有关、发生上有一定特点的若干个生态系统的聚合。它们实质是统一的,并且景观、文化、生态与人的感知是内部的统一和谐和有紧密的联系。文化景观的内涵是景观文脉,是一个城市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文化内涵及其有机联系,是区域自然地理背景、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沉淀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四维时空组合^[15]。

生产方式和生计方式在何时何地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文化景观是其最直接表现;文化景观是有形的,可以观察

的,是反映人地关系互动的直接参照,其中包涵诸多俗民智慧,这对于揭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有重要意义。任何文化景观及其相关现象都可以归结为时间和空间过程相互作用的综合产物^[12](p288)。如果暂时不考虑文化景观的时间差异,所有的文化景观均可以视为在同一断面上的地理存在,文化景观是有效认识人地关系的线索。

(三)文化景观遗迹是旅游拓展与形象定位的良好载体

多元文化交融区的文化景观遗迹沉淀有多元文化信息因子,富存可供挖掘与拓展的空间载体。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多元文化交融区多与“老、少、边、穷”地区相重叠,陷入文化景观遗迹极大丰富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的二难境地。

目前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东部、中部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西南地区的现代化,具有自然环境条件较差特征,战略性和紧迫性特征,异质整合的发展特征,在二元结构上进行社会现代化的区域文化特征等^[16]。90年代以来,西南地区社会现代化进展神速,水平很低。加速西南地区现代化,必须走西南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对其进行整体提升,首先在于进行旅游拓展。重要出发点便是在充分认识与保障文化景观遗迹的基础上,在不破坏稳健生态系统的前提下,进行旅游拓展。如九寨沟、黄龙作为西南与西北文明的交融地,其旅游成功开发即是国内典型案例;云南与老挝、越南等国家合作开发澜沧江——湄公河旅游项目便是国际典型案例。因此这为川陕旅游合作、川(渝)鄂长江三峡黄金水道合作开发、云南——孟加拉、印度旅游商贸拓展等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良好实践基础。第二,作好形象定位与形象。社会组织或地区的形象定位与形象传播问题在发达国家早已受到高度重视。中国西南地区毗邻东南亚、南亚,从地缘关系来说,这一地区首先应建构其在东南亚、南亚的良好形象。对西南地区进行形象定位,可从区域经济特色、市场特色、人口形象、地区文化形象、接受外来投资的政策与信度等入手^[17]。为进行西南地区的旅游形象传播,增进传播效果,建议各省区成立传播研究机构,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西南地区面向三种交融区的传播研究与协作中心。在传播中,应当特别注意传播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真实性是传播与形象的生命;艺术性是传播与形象的活力。同时,注意不要偏离传播的价值目标,形象传播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塑造西南地区形象,为西南各省市区的形象定位服务。二是把尽可能多的资金引进来;把西南地区的产品、服务推出去;促进西南地区与三种交融区的经济、技术、贸易合作;促进双边关系向产业地域分工协作演进;促进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朝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四)辩证认识地理环境对文化景观形成的作用

人文地理学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其研究对象与归结

点,强调分析社会现象的环境起始因素,关于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近20年来,在人地关系理论上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在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原因、中华文明产生地理因素、气候对历史趋势影响、我国北方农业区的衰退与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等方面有突破进展^[18]。独特的地理环境对西南地区文化景观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基础性作用,并且在人地互动的作用下形成文化交融区的文化景观遗迹。因此,我们既要摒弃地理环境决定论,也要走出简单的“人定胜天”论;只有辩证认识地理环境对文化景观形成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才能在尽全时空与人地互动思维下将历史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等发展为“人地时空学”。

参考文献:

- [1] 葛剑雄, 曹树基. 移民与中华民族的形成[J]. 历史教学问题, 2000, (3): 14-18.
- [2] 邹逸麟.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9-54.
- [3] 彭树智. 文明交往论[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 [4] 万本根, 蔡方鹿. 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40(6): 88-92.
- [5] 王文光, 龙晓燕. 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研究散论之二[J]. 思想战线, 2002, 28(1): 63-70.
- [6] 苍铭. 西南边疆历史上人口迁移特点及成因分析[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29(5): 11-17.
- [7] 蓝勇. 中国历史地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8] 李洋. 西南丝绸路上交流的东西方音乐文化[J]. 民族艺术研究, 2001, (6): 36-40.
- [9] 舒净. 全球化背景下的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民居色彩文化[J].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03, 29(2): 103-106.
- [10] 王恩涌, 赵荣, 李小林, 等. 人文地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43-44.
- [11] 司徒尚纪. 广东文化地理[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 [12] 赵荣, 李同升. 陕西文化景观研究[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9.
- [13] 胡兆量, 等. 中国文化地理概述[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4] 俞孔坚. 景观: 生态、文化与感知[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11-127.
- [15] 赵荣, 郑国. 论区域旅游规划中的景观文脉整合[J]. 人文地理, 2002, 17(4): 89-91.
- [16] 文献良. 浅论西南地区社会现代化的特征与现状[J]. 社会科学研究, 1998, (3): 72-77.
- [17] 秦启文. 应当重视中国西南地区在东南亚、南亚的形象定位与传播[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1): 21-26.
- [18] 华林甫. 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0.